



怎样又红又专

——做个共产主义劳动者——

中国青年出版社

2864
•2

怎样又紅又專

——做个共产主义劳动者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8年·北京

怎样又红又专

——做个共产主义劳动者

*

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出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36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售

*

787×1092 1/32 7 1/2 印张

1958年9月北京第1版 195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00 000 定价(1)0.42元

目 次

教育必須与生产劳动相結合·····	陆定一	3
一切反对教育同劳动結合的观点都是錯 誤的·····	教育部副部長 黄松齡	19
貫徹党的教育方針和学习方針·····	共青团中央第一書記 胡耀邦	28
貫徹“教育为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結合” 的方針·····	北京大学副校長 江隆基	33
青年要認真学习毛主席的教育思想·····	江苏师范学院党委書記 刘烈人	45
学习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論 教育·····	云 光、戴 卓、刘佩弦、許征帆	55
破除对资产階級專家的迷信是个方針性 的問題·····	清华大学党委副書記 刘 冰	64
什么是紅專知識分子的标准？·····	阮 銘	73
勤工俭学有助于紅專嗎？·····	东北工学院院長 靳树梁	83
把教育改革推向新的阶段，培养又紅又專的无产階級 知識分子·····	北京鋼鐵工业学院院长 高芸生	87
在高等教育的陣地上插上共产主义 的紅旗·····	北京航空学院党委副書記 臧伯平	93
从学生思想面貌的变化談起·····	北京工业学校党委副書記 郝連科	97
青年学生的紅專道路·····	北京鋼鐵工业学校校長 陈辛人	104
我們实行了教育与劳动結合的方針·····	北京农业大学副校長 施 平	109
从一个历史系的教育改革中所看 到的·····	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書記 張 斧	116
跨出学校大門，为工农羣众服务·····	北京医学院党委副書記 彭瑞聰	119

我們要培养什么样的人?	中央美术学院党委副書記 陈 沛	122
艺术院校学生不必参加生产劳动嗎?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長 陈叔亮	127
高爐奔鉄水, 紅專鮮花开	北京鋼鐵工业学院 奚同庚	131
学經济的也要大办工厂	中国人民大学 奚惟惠、蘆 章	136
我們在干革命	中国人民大学 苏 越	143
——記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办化肥厂		
打开紅專大門的鑰匙	中国人民大学 刘延洲、成 美	149
——記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大办報紙、印刷厂		
以紅帶專, 敢想敢做敢創造	北京矿业学院 郭夢熊	157
——記选矿教研組的石墨精选和回收高爐石墨		
誰說数学專业不能联系实际!	北京大学 叶其孝	162
向又紅又專的道路前进	北京矿业学院 吳志蓮	167
——矿业学院同学完成国家生产建設任务的故事		
在劳动中鍛煉成長	北京地質勘探学院 赵中奇、郭世琪、陈国南	174
——記一羣大学生参加开采煤矿的劳动		
是学校又是勘探队	北京石油地質学校 程貽俊	180
农业劳动把我們鍛煉成鋼	北京农业大学 李睿明	185
最好的春天	阮 銘、李仙根、楊詩秀、許季方、徐沛忠	192
——一羣青年水利建設者成長的故事		
一支工程队	北京水力发电学校 赵 杰	205
——記水力发电学校同学参加上馬岭水电站工程建設		
大学生办商店	中国人民大学 赵基凱、夏光仁	211
做劳动人民的好医生	北京医学院 程傳泰	217
在古典文学教学中大鬧革命	北京师范大学 張恩和	222
我們是怎样破除迷信的?	北京大学 刘竹立	228
——記批判游国恩先生資产階級学术思想		
年輕的画手們, 展翅飞翔吧!	中央美术学院 孙美蘭	233
——美术附中壁画創作簡記		

教育必須与生产劳动相結合

陆 定 一

“紅旗”編輯部按：陆定一同志这篇文章，是根据党中央召集的教育工作会议的結論写出的。党中央对这个問題即将有指示发給各級党委。我們希望各級党委在討論党的指示的时候，結合陆定一同志的文章予以討論。在学校党委討論此事的时候，可以吸收非党的教授教員参加。

今年年初以来，我国教育事业有了很快的发展。截至6月底为止，据国家統計局不完全的統計，全国已有一千二百四十个县普及了小学教育，民办中学达六万八千所，地方新办的高等学校达四百余所，全国参加扫盲学习的約达九千余人，全国已有四百四十四个县基本上扫除了文盲。整风运动和反对资产阶級右派的斗争的胜利，掀起了我国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又掀起了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高潮。教育事业的大发展，是文化革命进入高潮的标志之一。

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有两个措施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一个措施，是全国学校实行勤工儉学。另一个措施，是农业中学的开办。勤工儉学，开始把普通学校教育同生产劳动結合起来。打破了普通学校长期以来輕視体力劳动的旧傳統，改变了学校的風气，也对社会風气发生了很好的影响。农业中学是一种民办的半工半讀的职业（技术）学校，这种学校既解决学生升学的要求，又为农业生产准备技术人才，既比較容易办，又切合当前的实用，既不用国家花錢，也节省了

学生家長的經濟負擔，所以一經提倡，发展之快，犹如雨后春筍，几个月就有了几万所。由于高小毕业生不愁沒有升学的机会了，于是民办小学也大大发展起来，小学教育在不少省、市、自治区很快就普及了。由于生产发展的需要，成人教育也发展了，扫盲运动的高潮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业余文化技术学校也大量出现了。这种文化革命的高潮，又从乡村推进到城市，城市里出现了学校办工厂和工厂办学校的潮流。由于学校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結合，在学校里又出现了課程改革的运动，出现了改变学制的尝试，出现了教师队伍的改組等等。我们的教育事业，正如百花齐放，万馬奔騰。教育事业正在打破專家包办和教条主义的圈子，变为全党全民办学，变为适合于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这种改变，是在党的領導之下实现的。所謂“多快好省不适用于教育”，“外行不能領導內行”，“党委不懂教育”，“羣众不懂教育”等等謬論，正在被彻底粉碎。

我国是无产階級專政的国家，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我国的教育，不是資本主义的教育，而是社会主义的教育。沒有共产党的領導，社会主义的教育是不能設想的。社会主义的教育，是改造旧社会和建設新社会的强有力的工具之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目的，是要消灭一切剝削階級和一切剝削制度及其殘余，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消灭城市与乡村的差別和消灭腦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別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个目的，也就是社会主义教育的目的。这样的教育，只有无产階級的政党——共产党——才能領導，資產階級是沒有資格來領導这样的教育事业的。只有在共产党的領導之下，教育工作才能出現今天我們所看見的这种新气象。

最近几年，在教育方針的問題上，有过長期的爭論。在今年4月和6月中共中央召开的教育工作會議上，解决了一系列的理論問題和实际問題。

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針，向來就是，教育为工人階級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結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針，教育必須由共产党領導。这个方針，是同資產階級的教育方針針鋒相对的。資產階級的

教育，是由資產階級的政治家領導的，是為資產階級的政治，即為資產階級專政服務的，是同無產階級專政不相容的，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資產階級不敢直接地公開地提出要教育受資產階級政治家的領導，要教育成為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它只能提出“教育由專家領導”、“為教育而教育”的虛偽的騙人的主張，來達到反對教育為無產階級專政服務的目的。所以在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中，資產階級的教育方針表現為：為教育而教育，勞心與勞力分離，教育由專家領導。

教育首先是傳授和學習知識。但什麼是知識？傳授和學習的目的是什麼？對這些問題，我們共產黨人的理解是同資產階級的理解不一樣的。資產階級教育學者的大多數認為，只有書本知識才是知識，實踐的經驗不算知識。所以，他們認為，教育就是讀書，讀書愈多的人就愈有知識，有書本知識的人就高人一等。至於生產勞動，尤其是體力勞動和體力勞動者，那是下賤的，那是“絕路”。資產階級教育學者另外有一些人，則認為教育即是生活，生活即是教育。他們既不把生活理解為階級鬥爭和生產鬥爭的實踐，又不強調理論的重要性，因而實際上走到取消教育。資產階級的上述兩種看來似乎絕對相反的观点，來自一個共同的根源。他們說，人是沒有階級之分的，教育學是一門超階級的學問。

我們共產黨人的看法，與此不同。我們認為，教育學是社會科學。一切社會科學都要跟政治走，教育學亦不例外。人們是為了進行階級鬥爭和生產鬥爭而需要教育的。我們認為，世界上的知識只有兩門。一門是階級鬥爭的知識。這種階級鬥爭是以經濟地位劃分的人的集團之間的鬥爭，這種鬥爭已經存在了幾千年。現在，在我國過渡時期內，還有階級鬥爭。在將來，階級消滅之後，雖然階級鬥爭沒有了，但是還有人民內部的矛盾，因而一萬年還會有毒草，即是說，還會有真理和謬誤之間的鬥爭，先進和落後之間的鬥爭，對於生產力的發展的促進派和促退派之間的鬥爭。另一門是生產鬥爭的知識，即是人類與自然作鬥爭的知識。而哲學則是這兩門知識的概括和總結。哲

学之所以重要，因为辯証唯物主义的哲学給人們提供正 确 的 思 想 方 法。人与人的本質的区別，不在于“氣質”或性格的不同，而首先是階級立場不同，再則是思想方法不同。階級立場与思想方法，是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別的。錯誤常常来自两个根源，一个是階級根源，一个是思想根源。人們要不犯大錯誤或少犯錯誤，就应当学习政治，学习哲学。我們共产主义者又認為，有两种片面性的不完全的知識。同实际活动完全脫离关系的書本知識，是一种片面性的不完全的知識。毛泽东同志說：“学生們的書本知識是什么知識呢？假定他們的知識都是真理，也是他們的前人总结生产斗争和階級斗争的經驗写成的理論，不是他們自己亲身得来的知識。他們接受这种知識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必須知道，就一定的情况說来，这种知識对于他們还是片面性的，这种知識是人家証明了，而在他們則还没有証明的。最重要的，是善于将这些知識应用到生活和实际中去。所以我劝那些只有書本知識但还没有接触实际的人，或者实际經驗尚少的人，應該明白自己的缺点，将自己的态度放謙虛一些。”缺乏理論的、偏于感性的或局部的經驗，也是一种片面性的不完全的知識。毛泽东同志說：“我們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如果誤用了他們的經驗，也是要出毛病的。不錯，这样的人往往經驗很多，这是很可寶貴的；但是如果他們就以自己的經驗为滿足，那也很危險。他們須知自己的知識是偏于感性的或局部的，缺乏理性的知識和普遍的知識，就是說，缺乏理論，他們的知識也是比較地不完全。而要把革命事业做好，沒有比較完全的知識是不行的。”什么才是比較完全的知識呢？毛泽东同志說：“真正的理論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觀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觀实际中得到了証明的理論，沒有任何別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們所講的理論。”“一切比較完全的知識都是由两个阶段構成的：第一阶段是感性知識，第二阶段是理性知識，理性知識是感性知識的高級发展阶段。”“有两种不完全的知識，一种是現成書本上的知識，一种是偏于感性和局部的知識，这二者都有片面性。只有使二者互相結合，才会产生好的比較完全的知識。”（“整頓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教育的

目的，是使學生得到比較完全的知識，而不是片面性的不完全的知識。為此，就要求教師也要有比較完全的知識。

我們的教育工作者，常常說“教育是人民的事業”。這是好的，因為在我們的國家里，這是真理。但是，從九年的經驗來看，對於這句話也有兩種不同的了解。資產階級教育學者認為，人民羣眾對受教育是應該有份的，但是說到辦教育，那就沒有人民羣眾的份，只有專家的份。他們的口號是“教授治校”，“外行不能領導內行”，“黨不懂教育”，“羣眾不懂教育”，“學生不能批評先生”等等。對於資產階級教育家們所散布的這種迷信，有些同志也信以為真，忘記了我們黨曾經一千次一萬次被人們說成是“外行”，但是到了最後，事實都證明我們的黨是比任何內行還要內行一些。我們有些同志提出了這樣的主張：（一）只許國家辦學，（二）只許辦一種學校——全日制的普通學校。經驗證明：對於這種主張，資產階級的教育學者是很感興趣的，因為這可以束縛住羣眾的手，不許他們辦學。資產階級的教育學者明白：按照這樣的主張來辦教育，我國要想普及中小學教育就很困難，要想普及高等教育就毫無希望，因為國家無法負擔這筆龐大的經費，而且生產也會大受損失。我們共產黨人與資產階級教育學者不同。我們認為，人民羣眾是為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而需要教育事業的。人民羣眾既然會做革命工作和建設工作，那麼人民羣眾就不但可以受教育，而且可以辦教育。辦教育需要依靠專門的隊伍，沒有強大的專門隊伍是不行的，現在還應當用調幹部和辦師範的辦法大大增強這個專門隊伍。但是，教育的專門隊伍必須與羣眾相結合，辦教育更加必須依靠羣眾。只有在黨的領導之下，把專業的教育工作者同羣眾結合起來，採取從羣眾中來、到羣眾中去的羣眾路線，貫徹全民辦學，我國的教育事業才能夠而且一定能夠辦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也只有在黨的領導之下，貫徹全民辦學，才能統籌全局，兼顧各方，協調各方，既發展了教育，又使教育的發展有利於而不是有害於生產的發展。

我們的教育工作者還常常談“教育工作應該受黨的領導”，這无

疑是正确的，因为社会主义的教育必须由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必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但是，对于什么是领导，要什么样的领导，也有不同的理解。资产阶级教育家认为，所谓“党的领导”，就是“政治上由党领导，业务上由我领导”。在与教育无关的问题上，他们可以听党的话，但是如果党要来干涉教育的方针、政策、制度、方法等等，他们就认为是不能接受的。他们是口头上要党领导，实际上不要党领导，在次要的问题上可以听党的话，在主要的问题上与党对抗。我们党内从事教育工作的同志中，有些人对党委以专家自居，不尊重党委的领导，这是资产阶级的影响在党内的表现。近几年来，我国教育界里广泛地传播着一种“理论”，认为教育的主要规律是从教育史的研究中得出来的。因此，只要研究了教育史，并且抽象地承认党的领导，就可以办社会主义的教育了，用不着党对教育的具体领导。研究教育史，如果是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研究的话，那当然有好处，可以知道几千年阶级社会时代教育的规律。但须知，这种阶级社会历史上教育的规律，并不等于社会主义教育的规律，更不等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教育的规律。过去几千年的教育，乃是奴隶主手中的教育、地主阶级手中的教育和资产阶级手中的教育。从这样的教育史中找出来的主要规律，是剥削阶级的教育的规律。这样的教育规律，同社会主义的教育规律必然有很大的距离。如果照抄过来，必然要犯错误。实际已经证明，所谓“教育的主要规律是从教育史的研究中得出来的”，其实是借口教育史，把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教育政策、教育制度、教育方法等等原封不动地搬到社会主义制度下来，冒充是社会主义的货色而已。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主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诸人情况不同，许多人并无教育专著，然而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但是就教育史的主要侧面说来，几千年来的教育，确是剥削阶级手中的

工具，而社会主义教育乃是工人阶级手中的工具。从剥削阶级手中的工具到工人阶级手中的工具，是教育的质的飞跃，是教育本身的大革命。研究教育史而看不见这个质的飞跃，就是离开了辩证法，就是形而上学。我们主张研究教育史，但是反对那种认为研究了教育史就可以得出社会主义教育的主要规律的意见，因为这个意见，会使我们犯右倾的错误。不但如此，就是社会主义教育的规律，除了有共同性以外，也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特点。不研究自己的特点，就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我国的特点是什么呢？第一，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第二，人口众多，地区辽阔；第三，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第四，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第五，这是最重要的，我国是一个严肃地进行整风、反右的国家，是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的国家。我们应当根据我国自己的特点，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来规定我国的教育方针、教育政策、教育制度、教育方法等等。由此可见，所谓“教育的主要规律是从教育史的研究中得出来的”，乃是使教育脱离实际，陷入右倾错误和教条主义错误的一种非常有害的“理论”。不从本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况出发，这是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思想方法上犯了错误，就找不到事物发展的主要规律。只要不从实际出发，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就一定犯错误，不是犯右倾的错误，就是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或者两种错误兼而有之，这是在我国教育工作中应当得出的重要教训。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主张必须从客观的实际情况出发，因此必须首先认真地研究自己的情况，必须有热情来做这种研究工作。我们也认真研究兄弟国家的经验和认真研究历史，但目的不是去抄袭，去搬运，而是为了了解历史情况，了解教育方面的历史唯物主义，以便有所借鉴，依照自己的情况，做好自己的工作。我们不论做什么工作，都要紧紧依靠党的领导，因为正是共产党而不是别人，最了解我们自己的情况，最懂得马克思主义，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共产党必须而且能够领导一切。共产党从中央到基层组织，是工人阶级的有组织有纪律的先鋒队伍。我们

依靠这个队伍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依靠这个队伍取得经济战线、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也必须依靠这个队伍才能取得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胜利。我们的教育工作者，不仅在政治上应该接受党的领导，而且在教育思想、教育政策、教育业务等方面也应该接受党的领导，才能不落后于时代，才能少犯错误和不犯错误。

几年来教育工作中的争论，归根到底，集中地表现在“什么是全面发展”这个问题上面。“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类”，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经过教育来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常常谈全面发展，这是好的。但是，对于“全面发展”的理解，却有原则的分歧。从我国九年的教育工作的经验来看，资产阶级教育学者并不直接地公开地反对全面发展，他们甚至似乎是“积极拥护”这个方针的，但是他们主张把全面发展片面地了解为使 学生具有广博的书本知识，同时却既不主张学生学习政治，又不主张学生参加生产劳动。这就实际上把全面发展庸俗化，使它等同于资产阶级的所谓培养“通才”的教育方针。我们共产党人，对于全面发展的了解，同资产阶级教育学者的了解是根本不同的。全面发展，包含着这样一个根本内容，就是使学生有比较广博的知识，成为多面手，能够“根据社会的需要或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我们主张工人在工业生产中成为多面手，农民在农业生产中成为多面手，并且主张工人兼农民，农民兼工人，主张公民服兵役，军人退伍又成为生产者，主张干部参加劳动，生产者参加管理，这些主张已经在逐步实行。这种既有分工又能转业的办法，适合于社会的需要，比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分工合理得多，不仅增加了生产，而且在社会发生某种需要的时候，国家可以合理地调配生产力而不会引起社会的震动。我国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现在已经开始提出这样的问题：当某些产品达到了可以满足现时期人民的最高限度的需要而有余的时候，生产这些产品的一部分生产者就应当转业，转到另外的生产部门去，到那时，不转移就

不合人民的需要，不合社会生产力繼續发展和人民生活繼續提高的需要。我們的教育工作和国家的其他有关工作必須为这种轉移准备条件。教育應該使学生得到广博的知識，但是广博到什么程度，就要看具体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将来，在完全巩固、完全发展、完全成熟的共产主义社会，将要培养出能够作很多事情，能够担任很多职业但是又有重点知識能力的人。这是我們的方向，我們必須向这个方向走去。在当前我国的条件下，我們能够培养多面手，还不能培养出“能够担任任何职业的人”。全面发展所包含的另一个根本的内容，是学生所学到的知識，須是比較完全的知識，而不是片面性的不完全的知識。这就必須实行教育为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結合。馬克思对于他所理想的未来教育說：“这种教育使每一个已达一定年齡的儿童，都把生产劳动和智育体育結合起来，这不仅是增加社会生产的一个方法，并且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类的唯一方法。”（“資本論”第一卷）这就是說，要求学生学到比較完全的知識，不但能够用腦来劳动，而且还能够用手来劳动。仅仅有書本知識，不論怎样广博，还是片面性的不完全的知識。没有实际工作經驗而只有很多書本知識的人，只是資產阶级的所謂“通才”，并不是我們所称的全面发展的人。儿童时期需要发展身体，这种发展要是健全的。儿童时期需要发展共产主义的情操、风格和集体英雄主义的气概，就是我們时代的德育。这二者同智育是連結一道的。二者都同从事劳动有关，所以教育与劳动結合的原則是不可移易的。总结以上所說，我們所主張的全面发展，是要使学生得到比較完全的和比較广博的知識，发展健全的身体，发展共产主义的道德。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中說：“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就是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針。“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就是既懂政治，又有文化，既能从事腦力劳动，又能从事体力劳动的人。这就是全面发展的人，就是又紅又專的人，就是工人化的知識分子，就是知識分子化的工人。

我們主張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針，我們認為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类的唯一方法，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我們說“唯一方法”，就是說除此以外再沒有別的方法。资产阶级的教育学者不然，他們認為，要培养出他們的所謂“全面发展”的人，唯一方法是讀書，是死記書本，他們千方百計反对学生学政治，尤其反对学生成为劳动者。依照我們的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針，就可以而且應該依靠羣众来办学。依照资产阶级的所謂“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針，就只能依靠專家办学，不能依靠人民羣众办学。依照我們的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針，教育應該受党的領導。依照资产阶级的所謂“全面发展”的方針，教育只能由專家領導，用不着党的領導，因为党是“外行”。由此可見，对于全面发展的不同理解，就得出一系列的不同的以至相反的論点。所以我們說，几年来教育工作中的爭論，归根結底，集中地表現在“什么是全面发展”這個問題上面。这个斗争的性質，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教育思想之間的斗争。

按照我国资产阶级教育学者对于知識、对于教育是人民的事业、对于党的领导和对于全面发展的理解办事，我們的教育就要回到资产阶级的老路上去。正因为如此，所以必須把我們共产党人对于这些問題的理解，說个明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九年以来，我国的教育工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之下，取得了巨大的成績。这些成績是：从帝国主义者手里收回了教育主权；妥善地接收了全国的学校；取消了国民党反动派对学校的法西斯管理制度和对学生的法西斯教育和特务統治；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教育制度；基本上肅清了隱藏在教育界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在学校里開設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課程；在教师和学生中进行了思想改造；进行了院系調整和教学改革；进行了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和小学的在校学生都增加几倍；扫盲运动和业余的文化技术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学校中开始普遍地实行了勤工儉学；在教育工作者的队伍中建立了党的組織；为社会主义建設培养了大量的干部。但是，在教育工作这条战綫上，工人阶级思想

同資產階級思想之間的鬥爭是不斷地進行着的。這個鬥爭，按其性質來說，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之間的鬥爭。資產階級思想，阻礙着教育的发展。資產階級右派，在它猖狂進攻的時候，甚至企圖利用學生做資本主義復辟的踏腳石，當時章伯鈞、羅隆基、曾昭掄、錢偉長等都是這樣夢想過的。反右派鬥爭的勝利，工農業生產的大跃进，使坏事變為好事，人們比較深刻地認識了教育工作中資產階級思想的危險和害處。九年的工作，使我們得到了經驗，有可能來更加明確地和系統地闡明黨的教育工作方針。

教育工作中主要的錯誤和缺點，是教育脫離生產勞動。教育要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是我們黨在1934年就已經提出的方針。當時毛澤東同志就已經說：“蘇維埃文化教育的總方針在什麼地方呢？在於以共產主義的精神來教育廣大的勞苦民眾，在於使文化教育為革命戰爭與階級鬥爭服務，在於使教育與勞動聯繫起來，在於使廣大中國民眾都成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1954年，當經濟恢復的時期已經過去，第一個五年計劃已經開始的時候，黨中央又曾經提出過在學校里增設生產勞動的課程問題。但是遇到一些阻礙，沒有能夠貫徹。1957年3月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同年4月8日“人民日報”的社論，1958年1月的南寧會議，黨中央屢次強調了教育必須與生產勞動結合的主張。直到現在，黨的主張才在全國範圍內實現了。教育為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結合，教育必須由黨來領導，這三者是互相聯繫的。教育既然脫離生產勞動，就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忽視政治和忽視黨的領導。這樣，教育就脫離我國的實際，勢必發生右傾的和教條主義的錯誤。

教育與生產勞動結合，是社會主義革命所需要的，是社會主義建設所需要的，是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遠大目標所需要的，是多快好省地發展教育事業所需要的。

社會主義革命，是要消滅一切剝削階級和一切剝削制度及其殘余。現在，社會主義革命在經濟戰線上已經取得了基本勝利，在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我們的任務，如中國共產黨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決議所指出的，是“在繼續進行

經濟戰綫、政治戰綫和思想戰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積極地進行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文化革命，就是使我国六億人口，除了不能生产和不能学习的以外，人人都生产，人人都学习。就是使我国工农羣众知識化，同时使我国知識分子劳动化。工农羣众和知識分子双方各向自己缺乏的方面发展，才能彻底改变旧社会遗留下来不合理的情况，消灭两方面的落后現象，即消灭工农羣众缺乏文化的現象，也消灭知識分子中的資產階級思想。所以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革命，这个革命要求教育为工人階級的政治服务，要求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結合。馬克思說过：“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結合是改造現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哥达綱領批判”）沒有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結合，文化革命不能实现。文化革命，对于我們的国家，对于工农羣众，对于知識分子，都是有利的。只有坚持資產階級立場的人們，才不愿意有这样的革命。資產階級的教育方針，为教育而教育的方針，劳心与劳力分离的方針，是同社会主义革命不相容的。

社会主义建設，要求鼓足干劲、力爭上游，要求实行勤儉建国，也要求技术和文化，要求多快好省地培养出大批的又紅又專的技術人才。为了滿足社会主义建設的这个需要，也要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結合。列宁說过：“如果不把青年一代的教学和生产劳动結合起来，未来社会的理想是不能想象的；我們不可能把脱离生产劳动的教学和教育或者把脱离相应的教学和教育的生产劳动，提到現代技术水平和科学知識現狀所要求的那种高度。”（“民粹派空洞計劃的典型”，載“教育譯報”1956年第六期）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結合的方針，必然提高教育的質量，不仅仅在智育方面是如此，在德育、体育方面也是如此。劳心与劳力分离的教育方針，不能适合社会主义建設的需要。

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又是消灭了城市与乡村之間的差別的，消灭了腦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間的差別的社会。由于我国的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共产主义的实现已經不是很远的远景了。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社会，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百一十